

对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的评论

Review on the Theory and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慕海平

(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发展理论是对现实经济发展问题及其一般规律性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同时也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逻辑。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从经济发展理论的高度,对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式和道路(特别是某一类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的经验概括,体现了在特定条件下理论与历史的逻辑统一。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经济发展理论大致经历了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两大发展时期,前者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后者主要研究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崛起及其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大大地丰富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容,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也更趋多元化。

一、理论的回归

纵观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历史,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即无论是古典的经济发展理论,还是战后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以纯经济问题的分析肇其始,然后经过不断地拓展研究范围,最后以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理论的形成而毕其终。

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自由市场制度和西方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发展过程被看成一个在既定制度条件下不间断的、渐进的发展过程。认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总是一样的,只要具备了必要的资本积累,同时存在愿意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和市场,经济发展就可以发生。但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仍局限在纯经济分析的范围,并没有回答,也没想回答,为什么 19 世纪的工业化发展是发生在西方,为什么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采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形式。只是到了马克思·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找到西方经济发展的理性基础之后,才对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回答了这些问题。韦伯显然是从宗教、伦理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层原因,从而将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

引向了社会文化学的范畴。

无独有偶,战后经济发展理论也经历着这样的回归过程。70 年代中期以前,战后经济发展理论同现实的经济生活一样,正处于繁荣阶段。可以说,这一时期理论的兴奋点集中在如何加快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迅速地创造经济起飞的要素积累,进而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等方面。

70 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普遍的不景气,发展中国家前期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也开始表现出来,终于酿成了“发展的危机”。正是从那时起,战后经济发展理论也同时跌入低谷。对此,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轨道上来。但仍有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分析出现“发展危机”的深层原因,从调整发展观入手,对后起的经济发展问题及其诸多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揭示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及构成这种函数关系的中介过程,包括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国民性的改造等等。这些新的进展强化了经济发展理论的社会文化学倾向,构成了类似于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回归。

理论的回归和新的发展观的提出给战后经济发展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经济发展的目标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发展,发展战略由单纯追求工业化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经济体制从强调政府主导的决策部分地转向强调市场的分散决策和民众的广泛参与,等等。这一系列的转变所提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由于人不单纯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特定文化条件下造就的文化人,因此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过程之影响是复杂的和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绝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没有一种划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追求。说到底,经济发展是一个一般规律与特殊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冲突、变异和汇融。只有从这种结合中才能科学地把握住经济发展理论与模

式的进化线路和逻辑关系。

二、发展的形式:替代还是互补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发展形式的选择问题,即 19 世纪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式是否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怎样才能在中国家创造出与西方经济发展相同的“内核”——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伦理文化“等效物”。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同样需要阐明,后起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规定性究竟是什么,以及这种规定性与具体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当然,围绕以上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战后发展理论也形成了两个明显的派别。一是与古典发展理论一脉相承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提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认为传统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向现代社会迈进。它们把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看作是内生的,认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顺利的根本原因是来自内部的障碍。由此提出的发展模式就是“西方化”,认为由科技发展和工业化所形成的决定性力量规定了社会经济结构特点,西方国家的现状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未来结局。二是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这派理论向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其核心思想是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世界结构不合理及其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强调发展中国家独立的民族意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自主性。

战后发展理论的争论也反映到发展经济学领域,同样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派别,即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是有弹性的,因而也具有理性经济行为的特点,经济人会按照风险和预期寻求利益最大化。同时要要素是流动的,供给曲线具有弹性,结构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保证商品和要素市场具有相当的竞争性。因此,新古典主义主要是通过研究市场和价格,通过鼓励其发挥作用,进而提出其发展的模式。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历史的,要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必须首先了解其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包括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而使经济变化经常会遇到各种障碍、瓶颈和制约。因此,结构主义通过证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商品和要素的欠弹性以及市场的不完全,进而提供一个不依赖于市场力量而通过政府干预来管理变化的模式。

仅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来看,第一种思路及与之相联系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古典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延续,它将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看成是当代发展中国家所应该选择的道路,发展模式

也应该是唯一的;相反,第二种思路及与之相联系的结构主义(当然还有发展经济学的其它理论,如依附论等)是对古典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反动,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已经不具备走西方发展道路的条件,而必须采取一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模式,否则将无法突破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而只能长期徘徊于不发达的均衡之中,或是被置于永久性的依附状态,真正的发展难以发生。

围绕两种发展思路的争论构成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历史,而争论的技巧往往是试图通过对某一种思路的极端的解释,进而讽刺性地进行攻击,达到捍卫另一种思路的目的。实际上,理论发展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简单的替代,而是将各种思路看作是一个谱系,尽可能地去发现可能存在着的互补关系,寻找相互之间的混合。当然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互补和混合,则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经济形式和这一经济形式中被研究的具体问题。

历史的纵向比较,给我们许多启示,因而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摒弃那种认为 19 世纪欧洲的经验与现代不发达国家毫不相干的历史宿命论观点,同时也要批判那种认为第三世界工业化可能是 19 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精确复制品的看法,转而采取一种问题研究与历史比较相结合的观点,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认识,但又不能不借鉴西方模式,不同时期的发展问题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历史条件,但发展本身又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又是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都不能超越的。

从现实的发展情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述两种对立的发展思路都没有导致真正的发展。第一种思路不仅没有导致西方文明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反而出现了社会政治不稳定、失业、财务分配不合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过分依赖外国资本的困难。同样,深受第二种思路影响的拉美国家不仅没有获得自主的发展,相反却因债务危机的爆发而在 80 年代陷入了深刻的“发展的危机”。因此,一味地将普遍性和特殊性人为地隔离开来,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

其实,战后经济发展理论对许多关于发展形式的重要因素的评价,已经开始由替代走向互补,由对立走向某种结合,由片面走向综合。如对发展的投入要素的评价上,在强调物质资本形成的同时,也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发展结构的评价方面,肯定了工业化发展与改造传统农业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发展体制的评价方面,追求如何将政府干预与市场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与国际市场关系的评价方面,探讨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等等。应该说,战后经济发展

理论所发生的这样一些转化是积极的,这有可能将理论从低谷引向新的繁荣。

三、东亚经济发展的启示

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成功的发展当首推东亚地区。该地区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高速度和高效益被誉为“东亚奇迹”。该地区所奉行的以出口导向为核心内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和体制手段,又被称作“东亚模式”。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回答了战后经济发展理论领域所存在的一种悲观论点。这种论点认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体中,不发达经济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

东亚经济发展是在当代国际经济大背景下所呈现出的一种很有前途的经济发展模式,笔者在研究这一发展形式之后,对其要点做了如下的归纳:第一、东亚发展模式是包括初步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和经济转型的一个完整的和变动的历史演化过程。第二、东亚发展模式在战略上表现为,以高积累和高出口为基础,按照动态的国际比较优势原则,实施了一套外向型的产业配置方式。第三、东亚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政策上体现了竞争性的原则,其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和财政政策合力作用于增强产业的结构升级能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第四、东亚发展模式所依托的体制是一种温和的集权主义与自由市场原则的结合,从而较好地处理了稳定、开明的政治领导与实施有效的政策干预之间的关系、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与亲市场的干预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及公营部门与企业界及民营经济的密切联系与合作。第五、东亚发展模式的效应,是在贸易、增长与分配之间形成了一套符合资源赋存特点的良性的循环机制,其核心是鼓励民众对发展过程的广泛参与。第六、东亚发展模式的本质是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与后起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东亚地区儒教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调动了该地区传统社会的现代潜力,避免了社会经济巨大起伏和动荡,以较小的代价改造了传统社会,使落后的经济迅速走向发达。

东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启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经济发展的某些一般理论和模式,摒弃那些已经过时的片面观点和提法,转而采取一种中性的、开放的和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首先,东亚经济发展既具有依附性,但同时更是一种有效的发展。东亚所奉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形成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可是谁又能说这不是当代经济国际化和东亚资源赋存特点对其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般要求呢!当代发展问题是一个

全球性问题,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去谈发展,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均如此。东亚经济发展正是着眼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才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了一种带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和挑战意识的发展形式,主动地将经济发展纳入到世界经济的潮流中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东亚经济发展是一种强迫型的和赶超型的,它既具有非常规发展的特点,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应有的逻辑,最终实现了符合常规的发展目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亚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禀承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式,而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政府干预并不排斥市场的作用,而是主动地发挥了组织市场的作用,并且根据市场的发育情况,及时地调整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二是经济发展需要有大量的要素积累方能实现。传统的方式是通过对内对外的掠夺,实现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形成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东亚经济发展也采取了高积累、高增长的方式,但却是通过财政和金融的诱导机制形成的,在资源的利用上则实行了有利于平等分配的配置方式,鼓励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一般劳动者的参与。同时,政府还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从外部扩大要素积累的基础。总之,是通过非常规的手段,创造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条件,使经济总量增长、结构变化和机制转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再次,东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同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别,但是,东亚的经济发展并不以破坏这些社会条件、实现“西化”为前提,同样也不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现代化经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开放社会环境中,西方和东方的东西同时共存,传统融进了现代化的外壳之中,西方的许多文明也带上了东方的色彩。这种近乎完美的结合,有时是令人兴奋的。它常引人思考,这是显示了东方文明自身的博大精深,还是表明了西方文明的一种积极进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表明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发展的模式也必然会有所不同。西方发展模式不是通向发达的必由之路,但后起国家的发展又或多或少要继承发达经济的遗产,这是因为经济的内在逻辑有其一般性,后起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这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四、理论发展与多元模式

至此的讨论都是关于已有的理论与模式的分

析,还没有具体谈到正在变化着的因素对理论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些问题,过去的经济发展理论试图忽略,而将来势必应得到更大的关注。同样,对西方发展模式和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笔者认为,关于发展的经济分析,应扩展到市场经济学家不熟悉或怀疑的领域,起码应包括更广泛的福利目标、技术、制度和国家范畴。

经济发展显然不应再过于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发展的最终目标——减轻贫困、提高生活水平、推动参与、促进自由、改善健康状况等。经济发展应预示着能力的扩张,以能力扩张为导向而不是以简单地增加商品为导向,其实际功能便是不断拓宽发展的途径。调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潜力,应成为未来调整政策的重点。

技术知识因素是构成发展能力的关键。这里所谈的技术是广义的,应该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技术,以及发展经验的积累。发展中国家应集中力量解决学习技术知识所面临的障碍,克服“低技术平衡”状态,把发展视野从价格分析部分地转向技术分析。

制度分析在发展研究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制度正日益被看作是发展的内在变量。发展中国家是制度分析的最合适的地方,那里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都很高,如何通过制度的创新,改善信息、减少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家理论应该成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理论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追求有效的发展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屈服于强大的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短期“寻租”压力呢。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应是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能打破既得利益的国家,唯此,它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政策,谋求有效的发展。

上述因素并不能覆盖经济发展理论所应拓宽的全部领域,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这些因素已经和正在被提出。这并不表明,要在同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进行比较和权衡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这恰恰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是在互补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理论总是一般的,模式则相对具体。当代的发展对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历史所提出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当然是 19 世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模式,任何人都会否认,那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重要的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已经发生了,在东亚地区所创造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证明,没有一种历史逻辑可以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当然,障碍是存在,但并不是由必然的逻辑造成,而是历史环境所造成,而历史环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趋向多元化,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就具备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责任编辑 蔡德诚)